

周心慧 主编

古本小说版画图录

(修订增补本)

学苑出版社

周心慧 主编

•第一册•

古本小说版画图录

(修订增补本)

学苑出版社

古本小说版画图录（修订增补本）编委会

主编：周心慧

副主编：陈 坚 马文大

编 委：王致军 王逸明 翁连溪
郭 强 朱赛虹 王宗新

出 版 说 明

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》初版于一九九六年，迄今已逾五载。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版画第一部专题性的大型结集，此书受到了海内外收藏机构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披阅过此书的中国古代艺术史、版画史及书史、版本学史、印刷史研究者都指出，这是一部填补了古版画搜集、整理、研究领域空白的空前之作，第一次提供了相当完备的古小说版画原始资料，自此可免去资料难觅的困扰，或者即因为此，初版图书一、二年内即已售罄，而且不断有读者四处访购。这部学术资料性很强的图书能够被学界青眼有加，不仅撰集者始料不及，而且也是对撰集者的一个莫大的勉励。

不过，当若干年过去，撰集者重新审视此本，总觉得美中不足之处甚多，其一：资料搜集尚难称完备，尤其这些年来搜集到的一些古小说版画品种，一九九六年版未及载入，至为憾事。据统计，一九九六年版共收入图版一二三〇幅，涉及版本二四三种，此本则收入作品一七三六幅，涉及版本二八八种，无论品种数量，都有较大增加；其二：个别本子著录有误，如清阮元摹刻《古列女传》，传统皆以为初刻原刊为宋本，经诸多考证，已可确定为元建安勤有堂刊本；《名公批点合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》一书，或以为镌刻于广东，据清光绪年间刊《书林余氏重修宗谱》载录，则可确定刻于建阳。此类误著，无论产生的原因如何，都应亟予纠正，以免以讹传讹，遗误学界；其三：编排体例基本与一九九六年版同，但将明万历至崇祯小说版画统排，以求更完整地

反映晚明某一流派、地域小说版画的成就；其四：删去一九九六年版首册叙录，而将版本注释著录于每一版本首图，更好地做到了文与图和，同时节省了相当篇幅，得以录入更多的版画作品。

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遗存宏富，浩如烟海，此次再版，做了较大的增补和修订工作，比之一九九六年版，相信能更全面、系统、完备地反映古小说版画的成就。但这部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》（修订增补本）并不等于说已经尽善尽美了，肯定仍有不少尚待完善之处，尚需方家学者，有以教正。

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》（修订增补本）编委会

二〇〇〇年正月

凡例

- 一、本图录共辑入中国古小说版画一七三六幅，涉及古小说版本二八八种。所录作品，皆为元至清末雕印的木版画。石印等其他形式版画，概不录入。
- 二、所录作品，一般依刊刻时代次序排列。明万历至崇祯版画，时序下按作品所属流派及刊刻地域或坊肆集中。
- 三、每种版本均列有图版释文，以考镜版刻源流。释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：题名、卷（章、回）数、撰著者、刊刻时代及坊肆、绘图者、镌刻者。凡因原始资料失载等原因，个别项目可予省略。
- 四、图版释文中的书名，一般依图书卷端所题全名著录。图版标题中的书名，则只著录正书名，冠词、修饰语等皆予省略。
- 五、时间著录一般使用旧纪年，必要时在括号内夹注公元纪年。
- 六、根据本图版排版需要，得对原作尺寸予以适当变更，不皆囿于原大。
- 七、书前冠《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略》一文，可参阅。

中 国 古 代 小 说 版 画 史 略

周 心 蕙

中国古代小说版画历史悠久，遗存亦富，是中国版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。但迄今为止，很难见到有关古小说版画的专门论著，版画史论著在论及小说版画时亦草草带过，难以看出其发展脉络和历史全貌。为此，笔者特撰写此文，就古小说版画的渊源流变，提供一点个人的见解。

一、古小说版画的发端——宋、元

笔者认为，在述及正题之前，有必要对「小说」这一概念进行简单的诠释，以明确本书收录及本文论述的范围。

考诸史籍，「小说」一词最早见於春秋时成书的《庄子·外物》：「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」究其原义，指的当是那些浅薄琐屑的言论。汉代学者班固辨章先秦学术，条别源流，列小说家为九流十家之末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释其义说：「小说家者流，盖出於稗官。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。」汉桓谭《新论》则言：「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，近取譬喻，以作短书，治身理家，有可观之词。」说来说去，和《庄子·外物》的意思都差不多。桓谭谈到

「譬谕」的作用，说是「有可观之词」，算是把小说的地位稍稍提高了一些。依照上引释义，凡是从杂的撰述，都可称之为小说。清乾隆时官修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对小说这一概念做了总结性的解说。《总目·子部·小说家类》称小说「凡有三派。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。」其义和班固、桓谭所论，并无大异，只不过说得更详细、明白了一些而已。古人之言小说，大概如此。

由上文不难看出，在中国古代，小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颇为博杂的概念。具体些说，源于先秦的神话、传说、寓言；魏晋的志怪，唐、宋传奇，都属此体。至宋、元出现的平话，元、明以来盛行的章回体小说，才使其成为故事性文体的专称。可知古人之谓小说，与今人并不完全相同。

小说之作，由来已久。但其版画的出现，较之于宗教、儒学以及工技、农艺等类书籍，却显得姗姗来迟。据考，至少在唐朝，雕版印刷术就已经发明，并应用于雕印版画。现存最古老的，有明确年、月、日刊记的作品——雕刻于唐咸通九年（公元八六八年）的《祇树给孤独园》图，雕镂精细，布局严整，线条圆润有力，说明在唐代中、晚期，版画创作已臻完美。但从实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，当时还没有人用新发明的雕版印刷术，来为小说配置图版。继唐而起的五代，版画创作成就斐然，但亦无小说版画传世。

公元九六〇年，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建立北宋王朝。宋朝诸帝，皆标榜文治，以偃武修文为国策，版刻书籍由此大兴。以版刻图画而言，虽仍以佛教经卷版画为主，其他一些种类的图书——包括可以归入小说类的故事书，也开始运用插图，从而揭开了古小说版画的第一页。

文学传记、故事类图籍版画，宋代已有梓行。宋代帝王很重视利用此类版画图释古圣明君治国为君之道，以垂训子孙，使其礼法先贤，而成圣德。据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六载：「景祐初元（公元一〇三四年），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，人物才及寸余，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，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，凡一百事，为十卷，名《三朝训鉴图》。图成，复令传摹镂版印染，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。」另据王明清所撰《挥尘后录》卷一《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镂版禁中》条亦载：「仁宗即位方十岁，章献明肃太后临朝。章献素多智谋，分命儒臣冯章靖元、孙宣公奭、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《观文览古》一书；祖宗故事为《三朝宝训》十卷，每卷十事。又纂郊祀仪仗为《卤簿图》三十卷。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，极为精妙，述事于左，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，解释诱进，镂版于禁中。元丰末，哲宗以九岁登极，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，亦命取版摹印，仿此为帝学之权舆，分赐近臣及馆殿。时大父亦预其赐，明世家因有之。」以版画形式，利用其直观的优点，训戒子孙凛遵祖德，是宋王朝的一大发明。《图画见闻志》卷四载：「高克明，京师人，仁宗朝为翰林待诏，……尤长小景，但矜其巧密，殊之飘逸之妙。」高克明之画技，此本之精丽绵密，是可以想见的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著录《三朝训鉴图》十卷，书成于皇祐元年（公元一〇四九年）即为此书。虽为史鉴类的故事著作，亦可视为小说版画的雏形。可惜的是，这部宋刊版画的洵洵巨制，今已无传。

元代刊刻的版画，艺术上较两宋更为成熟，题材也更加广泛。如宗教、儒学、类书、戏曲，以及工技、农艺、医药等类图籍皆有插图本行世，传留至今的小说版画遗珍数量上也远比两宋为多。所见就有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》、《三分事略》、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等。

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》，晋干宝撰，建安书肆刊于元至正（公元一二三四年——一三六〇年）间。

该书列儒、佛、道为三教，汇录各教尊者于其中，敷衍故事，配以图版。图为整版，疏朗醒目，镌刻虽略嫌粗略，却不失生动。所写人物气韵自在，是一部十分著名的版画杰作，也是研究草创时期小说版画风格及版式的珍贵资料。

《三分事略》，元代讲史平话，元至元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二九四年）建安书肆李氏书堂刊本，上图下文式。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，演述三国故事的最早刻本。这个本子与稍晚出的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》，版式全无二致，唯雕镌粗糙，刀笔板滞，线条僵硬平直，与后者艺术上的成熟、完美，实有上下床之别。在元刊各类版画中，这样草率粗陋的作品，亦属罕见。但作为草创时期的小说版图之作，自应占有一定地位。此本和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》的关系，李氏书堂的情况，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。相比之下，刊刻于元代中叶至治年间（公元一三二一—一三二二年）的《全相平话五种》，在古小说版画发展史上的意义则显得更为重要。此为传世仅存孤本，藏日本内阁文库。一九五六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以影印，使人得见其原貌。

平话五种包括《全相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》、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》、《全相续前汉书平话》、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》。扉页题「建安虞氏新刊」、「至治新刊」字样。刻工题记有「樵川吴俊甫」、「黄叔安刊」。从现有资料看，这两人就是中国古小说版画史上最早有姓名可考的木刻艺术家。尚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一套按时代顺序依次展开的讲史平话，当时所刊，并不仅此五种。如《前汉书平话》既称「续」，则应有「正」编在前，只不过已然佚失，今人无复得见了。

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皆为上图下文，总计二二八图，在情节发展上首尾相连，一气贯通，汇为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长卷。图版制作精缜绵密，人物形象生动而富变化，经营布局协调稳妥，

屋宇、楼台，乃至一石一木，一几一案，选取无不合宜，营造出了很好的场景氛围。刀锋圆润、韧而有力，洋洋洒洒二百二十八图，毕竟无一败笔，成为元刊版画中的著名典范，也是中国现存历史较久的讲史小说祖本和连环画长篇。为明代建安派上图下文式小说的大发展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提供了优秀的样本。美中不足的是，由于绘图者对古代衣冠典制不了解，当时去宋未远，平话讲述先秦、秦汉事，所绘服饰、宫殿、园囿，却多以宋、元样范为本，未免看上去不伦不类。宋、元两朝，平话创作极盛。以当时书业之发达，所刊当不只以上数种。但由于年湮代远，小说作品在当时又被视为「下里巴人」，不为公、私藏家所重。今人所见，才如吉光片羽，难寻难觅，实为一大憾事。

现今所能看到的元刊传记故事书插图，有元建安余氏靖安勤有堂刊刻的《古列女传》。署「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编撰」，分母仪、贤明、仁智、贞顺、节义、续列女等八卷。卷首长乐王回序称：「向为汉成帝光禄大夫。当赵后婕妤（赵飞燕）嬖宠时，奏此书以讽宫中」，是一部譬喻之作。此本有图一百二十三幅，署「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」，不少人认为，取现存传为顾恺之绘《列女仁智图》与此本图画相比，二者画风确有一些近似之处。但笔者认为，顾恺之是否绘过这样一部一百二十三图的长卷，实在令人怀疑。如果此图果系出自顾氏之手未传之于今世，可以用年湮代远来解释的话，则若宋代尚见真迹，画史著述即不见提及，画目书亦不见著录，就不合情理了。顾氏画作传及元世，论其价值已逾连城，它如何能被余靖安这样一位书肆老板所得，此后传承情况如何，何时佚失，史传皆无片纸只言提及，是不可能的事。故笔者认为，基本可以肯定此本插图与顾恺之无涉。至于两者画风有近似之处，善绘事者稍加模仿就可办到，更不足为据。建安刻书，最喜假借古人名义以牟高价。西晋惠帝时贾后专权，秽乱宫帏，张华撰

《女史箴》已为鉴戒，顾恺之的确据此画过一幅《女史箴图》，今尚有隋代摹本传世。张华撰述，与刘向《古列女传》其意本同，顾恺之在宋代艺苑极被推重，故余靖安藉此以炫惑世人，首开了在版画上借古人名姓欺世的先例，后世版画，动辄刊署丹青圣手的大名以自高身价，即以此本为肇端。

在今人看来，这部《古列女传》的插图是否出自顾恺之的手笔，都不影响它在中国版画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此本插图为上图下文式，是除佛教题材外，现今所能看到的，较早的上图下文式版画连环画，尽管这种版式非自本书始，它却使其相对规格化了。在镌刻技艺上，线条较简约，体现的是粗率质朴的作风，成为元及明初版画最常见的风格，作为早期传记故事版画，艺术价值也是较高的。此本元刻今亦已无存，即使元、明传摹的本子也很难见到，尚能见到的本子，为清道光间扬州阮氏的影刻本，图版简约古朴，旧时坊肆，常有以旧纸摹刻伪称宋刊以沽高价者，可见其仿真摹古程度之高。

此本的初刻原刊，一向认为梓于宋嘉祐八年（公元一〇六三年），清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称：“绣像书籍以来，以宋刊《列女传》为最精”，所指即为这部《古列女传》。肖东发先生在《建阳余氏刻书考略》⁽¹⁾一文中详加辨析，指出勤有堂实为元代建安名肆，主人为余志安，又名安定，字栎庄，崇化里人，所刻书皆为元代刊本，靖庵或为其别号。把这部《古列女传》归入宋刻，是将宋代建安名肆余仲仁的万卷堂与元代余志安的勤有堂相混淆了。

宋、元两朝，是中国古小说版画史的开创时期。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发明之后，经过五代数十年的探索、实践、总结，至宋、元时在技法上已颇为完善和成熟。所以，古小说版画自问世之始，就取得了足以骄人的成就，并为其在明代的大发展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二、承上启下的明代早期小说版画

依笔者愚见，明代小说版画的发展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，即：第一阶段由明开国至嘉靖；第二阶段为明万历时期；第三阶段为泰昌、天启、崇祯三朝。不言而喻，这是按照小说版画的发展脉络，做出的艺术上的阶段划分，而不是根据王朝兴衰所做的历史分期。这里所说的第一阶段，实际上包括了史学划分的明初和明中期，经历了洪武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等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。原因无它，唯在于这一时期内，古小说版画基本上处于稳步发展中，并无引人注目的突破和飞跃。

明代早期的版画艺苑，相对而言还是相当寂寞的。除去由于统治者的提倡，佛教版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外，其他种类如道教、医书、孔孟圣迹图、音乐、画谱等版画，虽有佳作，数量均极少。相比之下，古小说版画则更显萧疏。但尽管如此，其间有些作品，还是很值得一谈的。

明洪武（公元一三六八—一三九八年）至明天顺（公元一四五七—一四六四年），历时一百余年，小说版画一片空白，并无片纸只页留存。经过宋、元的启蒙，其竟然被冷落至此，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。或者其间并非无小说版画镂版，只不过已经佚失而已。

一九六七年，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中，出土了一批明成化年间（公元一四六五—一四八七年）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说唱词话。所谓词话，有说有唱，实属讲唱文学向小说的过渡形式。这批本子插图宏富，今日所见明初小说版画，以此为最早。

此次发现的词话，计十二册，三百六十一页，其中讲史类三种：《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

出身传》、《新刊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》、《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》；公案类六种：《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》、《新刊全相足本仁宗认母传》、《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记》、《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》、《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》、《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》；传奇类二种：《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》、《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》；另附南戏《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》一种。其中以刊行于成化七年（公元一四七年）的《石郎驸马传》和《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》为最早，刻印于成化十四年（公元一四七八年）的《花关索出身传》为晚出，另有数种牌记无存，很难判断具体年月。一九七三年，上海博物馆将这批词话汇为一函，影印出版，冠以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》总名，才使世人得见其本来。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》的发现，在中国古典小说、戏曲、古版画史上，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。就古小说版画而言，与元刊诸本相比较，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，应给以足够的重视：

(一)、艺术手法趋向多样化。其中《花关索出身传》为上图下文，形式、风格与《全相平话五种》全无二致，雕镂细致精缜。其他诸本则镌刻得大刀阔斧，雄浑劲健。元刊常见的阴刻与阳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别具一番粗豪的力度；

(二)、版式富于变化，打破了宋、元小说版画上图下文的单一格局。除《花关索出身传》外，其他诸本皆为整版图，计凡八十六幅——这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整版小说木刻版画。他如《富贵孝义传》、《断歪乌盆传》等，版框中间用直线或云纹等花饰隔开，上下各一图，也是开创性的。这种表现手法，直到清末民初的石印版画仍见采用。为研究古版画版式、版型的发展变化，提供了丰富的早期实物。

(三)、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》，是明初北方小说版画硕果仅存的遗珍，亦是有明一代极

罕见的北方小说版画实物，填补了古小说版画史上的一大空白；

(四)、如果和现存较早的戏曲版画，明弘治十一年北京金台岳氏刻本《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》结合起来看，对研究明初及明中叶北方戏曲、小说等文学版画的发展，以及晚明形成的南盛北衰的古版画艺苑格局，提供了史证。

相比之下，这一时期南方小说版画的刊刻，较北方还是要发达一些，遗存的数量和品种也更多一些。首先要提到的，是刊刻于明正德六年(公元一五一一年)的《新刻剪灯余话》。这是一部很有名的笔记小说集子，建安杨氏清江书堂刊本，上图下文式。图刻朴素生动，在建安派小说版画的早期作品中，很值得注意。

明嘉靖(公元一五二二—一五六六年)一朝，是中国古版画也是明代版画史上的重要阶段。在此期间，版画艺苑逐渐趋向繁荣。一方面，无论作品的种类还是数量，都比以前有较大增加；另一方面，绘刻渐趋工丽细致，是明万历时古版画大发展的先声。

《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》，明嘉靖三十一年(公元一五五二年)闽建书林清白堂刊本，书演岳飞抗金事，为「岳传」故事的最早刻本。图为全幅大版，双面连式，在以上图下文为主要形式的建本小说版画中，显得十分瞩目。图版绘刻粗豪而有气势，颇为壮观。就版式而言，这也是现存最早的古小说版画双面连式图，极大地扩大了作品的表现空间，为古小说版画的发展，开辟了新路。此外，嘉靖刊《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記大全》、《新刊诸家选辑五宝训解启蒙故事》，都是用小说形式编写的学童蒙学课本，皆为上图下文式，亦同为建安书林所刊。嘉靖年间翻刻的元刊《新编连相搜神广记》，书名署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，刻得也颇为精彩。

明隆庆(公元一五六七—一五七二年)历时仅短短六年，所遗小说版画有《五显灵官大帝华

光天王传》，上图下文式。牌记署「辛未岁孟冬月」。辛未或为隆庆五年（公元一五七一年），或为崇祯四年（公元一六三一年），从图版的表现手法看，似应判断为刊于隆庆五年为是。卷端署「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」、「书林昌远堂仕弘李氏梓」。「昌远堂」的刻本极少见，故有人认为其实在就是余象斗的刊本。查余象斗始操剞劂之业，是在万历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九一年，详后文），此说之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。

由上文不难看出，这一时期的南方小说版画，建阳书林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。建阳木刻家留下姓名的不多，但他们在古小说版画史上的先锋作用，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。

三、百花齐放的明万历小说版画

明万历（公元一五七三—一六一九年）时期，是中国版刻图画的黄金时代。当时的刻书家，极为重视图的作用，所刻版画品种之多，数量之大，皆远逾前代。并由于地域的不同，逐渐形成了建安、金陵、新安等不同的艺术流派，下文即依次介绍各个流派小说版画的渊源流变，艺术特色。以期藉此为明万历年间错综复杂的小说版画格局理出头绪，给出一个内容全面、脉络清晰的印象。

（一）、建安派小说版画

就小说版画而言，福建建安派历史最久，自元刊《列女传》、《连相搜神广记》、《全相平

话五种》，至明嘉靖、隆庆诸本，皆为建版。就其发展来看，建安版画曾有两个雕印中心。宋、元时书坊多聚集于建安县，入明后渐衰，建阳县则取而代之，成为书坊林立之处。两处所刊版画，风格无异，故统以「建安派」名之。

自明万历至明亡，是建安派小说版画最为兴盛的时期。其间书肆主要集中在建阳县的麻沙、崇化两处。相比之下，更以崇化为大宗。嘉靖《建阳县志》载：「书市在崇化里，比屋皆鬻书籍。天下客商贩者如织，每月以一、六日集。」据统计，现今尚有名称可查考的坊肆，就有九十九家左右。⁽²⁾书业之盛，可见一斑。这些坊肆，刻印了大量的小说版画。可以说，古小说版画的大繁荣局面，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的。

余氏是建阳书林中最著名的刻书世家。据清光绪年间新安刊《书林余氏重修宗谱》载：余氏先祖因官建阳令而入闽，宋朝由仕宦从事刻书业，南宋时的万卷楼及勤有堂，皆为余氏名肆。明初不振，中叶稍兴，嘉、隆间渐盛，万历时复大炽，开肆业书者不下二十余家，至清初仍见有余氏刊本行世，前后历四百余年，其间不少坊肆，都刊行过大量版画，是建安派版画的主力军。

余氏坊肆中，以双峰堂所刻版画品种最多，数量最大。双峰堂主人名余文台，字象斗，号三台山人。据《余氏宗谱》，他大约生于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，其祖父余继安于嘉靖十二年（公元一五三三年）建清修寺，「以为子孙讲学之所，亦可为印书藏板之地」，可知余氏中的这一支，至迟在嘉靖时即已从事刻书业了。另据日本东京大学藏万历双峰堂刊《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家评注史记品粹》余象斗序：「辛卯之秋，不佞斗始辍儒家业，家世书坊，锓籍为事，遂广聘縉绅诸先生，凡讲说、文籍之碑业举者，悉付之梓。」辛卯为万历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九一年），余象斗就是从这一年专心于书业的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。